本土化與全球化的挑戰

●廖炳惠／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全球化」在八〇年代成為熱門課題，此一概念其實與本土化並不相互衝突，它指跨地區的流動，尤其是人群、資金、技術、影像、音樂及理念等的流通，這些文化形式到達另一地方，在當地產生變化，透過各種挪用與創發方式，形成新的脈絡，也就是本土化或在（再）地化。本文分成三部份，第一部份探討全球化理念在學術界中正反面的評估；第二部份以全球化歷史說明本土化與全球化並不是辯證或差異的發展，而是相輔相成；第三部份從教育、學術論述到國家競爭力、政治形式，探討當前台灣學界對本土化的諸多誤解，如：以為本土化是自滿、自大、自傲，甚至自絕的活動，在此種論述下，我們該如何對本土化及全球化重新思考，提供建議，特別是對新政府目前在文化建設上的問題做出具體呼籲。

本土化及全球化是否為兩種極端、彼此互不相容的活動？本土化是否是在全球化的挑戰下才發展出的文化民族主義，用來針對全球化的發展產生反應，甚至是反動，而造成較偏頗的民族主義的發展？或者說，全球化是否是二十世紀經過跨國的貿易組織，如WTO、G7等，或聯合國各種世界性團體的交流與協商情況下展開，特別是到了九○年代，全球化網際網路社會完整呈現之後，全球化變成是晚近的社會文化現象？全球化是否有可能更早出現，且與文化在地發展（localization）活動有相當大的關聯？在這些問題下，我們應展開論述，針對台灣能否於世紀轉折，二十一世紀來臨之時，在本土化及全球化的挑戰之中，僅以幾個標竿宣示之舉，如語言上將英語當成第二外語，將台灣各種語文利用羅馬拼音的方式，納入日常生活視覺範圍內（尤其成為可見的路標），或將本土文化的教材設計加入課程就可以達成？是否該在發展台灣文化品牌、產業、文化創意的結合上加深思考？本文擬以這幾個問題來作為開端，和大家一起思考台灣如何面對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挑戰。

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全球化與本土化的相關論述，「全球化」（globalization）這個字眼與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有密切關係，甚至可推至更早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但是這個辭彙真正被廣泛使用是在八○年代中期時，特別是Roland Robertson、Mike Featherstone、Scott Lash及其相關的文化研究者，推動這個辭彙來說明地球村的觀念，也就是經濟和文化力量已經讓全世

界的各種生活方式，從個人到社群都被全球文化經濟的動力整個穿透，因此在人口流動、財經交易、技術交流、反恐保全、衛生醫療、環保生態、文化理念、宗教網絡，從影音藝術的傳播，有線電視到網際網路，各種電影音樂的傳播到科技理念、意識形態、宗教等文化形式的跨國界流動，使得全世界不再有疆界，似乎愈來愈同質化，而消費行為普遍化，特別像是麥當勞、CNN、微軟等機構在全世界各地的普遍發展。在不少面向上，國家逐漸喪失主控權，而跨國公司及跨國的組織（如聯合國、人權、消費、觀察及環保機制）則逐漸提升影響力，從科技發展、新聞媒體、教育研究到生活方式，透過服務的提供，跨國公司在資訊、技術、服務、市場這四大面向上，造成跨國世界村裡，近乎統一而又同質性的發展。譬如威而剛或藍色藥丸，在全球化的醫藥服務中，提供全球男性及女性生命力以及回春的希望，不分國界皆能感受到此種服務。更普遍的如CNN，華人Star TV在全世界各地播放的情況，都產生相當深遠的影響。

因此，在八〇年代後，這個辭彙逐漸取代了「國際」（international）這種字眼，而轉向文化、經濟的討論。「全球化」這個辭彙其實還能追溯至1974年Immanuel Wallerstein，及後來Manuel Castells、Anthony King等人所謂的世界體系的觀念，也就是全球經濟產生一種世界為體的觀念。全球化理論的代表人物，從Immanuel Wallerstein，Roland Robertson至Arjun Appadurai，均認為在全球化的活動下，本土的小社群受到相當大的衝擊，在因應這種情況下，他們紛紛提出本土及在地的文化辯證，或是透過Sony老闆從global和local創造出新字眼，也就是後來Robertson所援用並加以擴充提出的「在地全球化」（glocalization）的觀念。在地的文化形式會將全球化的資訊、語碼、技術、形象等資源轉化為利用本土的方式處理，因此稱之為本土以及全球的混合。

對全球化此一過程的評估，一開始時，大家對於全球化是相當樂觀的，認為它能帶動全世界更容易地接受資訊、科技、服務等便利，尤其在市場上，它能使許多國家，特別是落後的國家，很快地在財經、文化、交易等活動上，迅速地達到相當水平。在這個面向上，世人能利用全球化的社會組織達成全球性的繁榮、和平，特別是地球村上的生態保育，能夠跨國地利用外地來的技術、專業人員、資金以及對土地和植物的概念，來重新作好培育及預防的措施，如亞馬遜河對地球天氣及生態的影響，全球的科學家們很早就提出全球化有關臭氧層、熱帶雨林破壞的問題，乃至於空氣污染、沙塵暴、族群暴力、宗教迫害、飢荒、愛滋病診治及醫療服務等，這些都是全球化的運動，讓大家感覺到除了這個地球外，沒有另外一個地方，而以這種地球村的觀念來彼此互相提攜，形成共同的責任，讓全球文化、經濟共存共榮。

這是一種較正面的定位，但是到了八〇年代中期以後，我們可以說，全球化的論述逐漸地形成較具批判性的聲音，因為全球化帶來了一些問題，特別是貧富懸殊，新的經濟階級在第三世界形成新的恐怖政治，跨國公司的摩天大樓在土地上過度開發，全球化保衛和平的方式使美國與聯合國維持過多兵力，跨國公司對當地傳統的經濟及文化生活形式造成巨大破壞並使之破碎不堪、將瀕臨喪失語言的弱勢團體邊

緣化，使之逐漸無法與英文、中文這些主流文化對抗，社會中弱勢者的政治力量被全球化商機所壓抑，形成變相迫害及非民主的政治行為，這些都是全球化對當地社群所造成的迫害。因此八〇年代中期以後，特別是到了九〇年代，隨著美國的雷根主義、英國的柴契爾主義，這種過度強調自由、競爭、削減弱勢或內部差異作風的全球化觀念沒落，大家嘗到苦果，隨著反世界貿易組織（WTO）、反全球組織的政治反對黨（如綠黨）逐漸形成之後，紛紛透過本土政治運作的方式以拯救母語、生態環境、瀕臨絕種的動植物，來拒絕速食跨國公司的蠶食鯨吞。在這種新的發展脈絡裡，全球化的概念常與文化帝國主義或新殖民主義相互關聯。

但在同一個情況下，很多學者開始思考在（再）地化和全球化兩者互相糾纏（entanglement）的狀況，並且從全球化的發展歷史來看，追溯至更早期的人口流動，尤其是十七、八世紀的人口販子在非洲、中國南方等各地，將人口販賣至大西洋兩岸，讓他們作為廉價勞工，這整個人口的流動帶著大量的群眾到另一個地點，以他們的工作和精神傳統，產生出非常多元的文化表達、生活習慣和生產力，也因此帶動了早期的全球化，所以比較晚近的批評論大部份會認為全球化與殖民主義、人口販賣（slave trade）有相當大的關聯，它絕對不是到了八○年代因為網際網路、跨國公司的大量發展，全球摩天大樓利用跨國科技在各城市中大量興建的這個階段才真正形成。這些學者，如Homi K. Bhabha、James Clifford、Nestor Garcia Canclini、Paul Gilroy等，就認為這整個發展過程至少有二百年的歷史，而且在發展過程中與本土化密切相關。

以台灣的例子來說，我們可以觀察到全球化在台灣的運作上，並不是完全普及地接受各地文化，在文化選擇、消費嗜好、品味發展上，台灣的全球化是接受了美國、日本和中國的許多影響，在這個面向上，是和早期漢人移民強調效率、追求立即擁有、透過物質方式呈現財富的文化息息相關。因此，台灣的流行文化是特別地多變、短暫且富有善忘的特色。但是，台灣對於其他各地文化的抉擇，是有許多歷史性的因素。全球化並不是全盤皆收，或是與外面世界達成統一性、同質化的時空壓縮之狀況，它是舶來與本地文化每天在日常生活裡協商的過程中所產生出來的。

潘英海教授就從南中國到台灣的許多移民們所保留的地契文書中，透過他們與原住民的交易行為，以及所發展出的宗教崇拜儀式、家族活動，分析出其實漢人來到台灣是經過了「在（再）地化」的發展，他們在許多儀式上的崇拜，尤其是南台灣的「拜壺」，結合了平埔族及原住民的儀式，把從海陸兩地轉移過來的王公、神鬼崇拜與原住民的宗教儀式聯結在一起。從早期荷蘭的傳教活動，滿清在台推廣的建設到日據時代的整個發展，台灣許多仕紳的品味決定了留學國家的優先性，也因此在全球化過程中，許多限制與力道是受到了地理和歷史因素的多元決定。所以我們不能夠說全球化就是美國化或是全球同質化的發展，它在理念上應該是在（再）地化的，這兩種活動是互動、互相對話、互相轉變的過程，而且這種過程應該是用複數，而不是用單數。

在這個面向上，台灣有很多學者對全球化過度的樂觀，而對本土化產生質疑，這

是有些偏差的，比如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朱敬一，在早期一篇文章裡就認為台灣的學者應該要儘量國際化，不能夠只發展台灣本地的論述，不能夠只用中文或是台灣話來書寫，應該要邁向國際去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他的用意當然是值得肯定，但是他認為本土化勢必會導致自傲、自大、自絕、自閉，這些帽子未免扣得太大。只在美國一些期刊上發表英文著作就能夠達到國際化？把所有論文量化就能得到外國學者的尊重嗎？在許多社會學科及科學界裡，常會有這樣的誤解，認為全球化就是真正的主流，而在（再）地化只是主流底下的逆流，要順應主流作某種形式的配合。他們認為台灣文學、台灣歷史、台灣文化的研究，只有在受到國際期刊重視時，才具備份量，受他人肯定。當然，本土化一定要邁向國際的承認，這個用意上並沒有太大的問題，我們也能夠同意這種走向國際、爭取認同的觀念，但是在把全球化和在（再）地化變成是相互對立，並且用自絕、自閉的方式來形容在（再）地化，這可能是對於在（再）地化、本土化的過程有相當大的誤解。

最明顯的就是文化平台在電腦技術的發展上，利用窗口的方式找到對映的表達，來形成跨國的討論，也就是在這樣的框架下，利用外來的技術把便利於當地使用的軟硬體作某種形式的協商、配合、交流、轉換。我們可以看出，許多文化未必是要脫離本土化的，例如全球最大的手機製造商Nokia，它是芬蘭的一個地名。在文化品牌上，許多大公司通常在自己的社區裡顯現出某種特色，比如說Sony，表現出株式會社在日本研發耐看、耐用的精緻文化，將社區裡日本的特色發展成為全球品牌，全世界的顧客都能因為購買這種產品而對社區文化顯現信心，對國家文化特色有所信任，以這種方式產生出全球化的生存空間。

因此，從台灣早期的發展，南島文化和南中國文化的交會，在吸收許多外來文化的過程中，台灣人運用了許多混雜的本土化過程，挪用漢人、日本、美國以及南島等地的語言、生活習慣和信仰系統等的整合。我們可以說，台灣在文化上作了許多在（再）地化的重新發明，也因此「認同」在國家影響力逐漸消減的過程中，經常還是相當重要的。比如台灣人到大陸、台灣人聽到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衛生組織、亞運、奧運對台灣的抵制時，馬上形成的就是對於中國或世界團體排斥台灣的反感。我們可察覺出對全球經濟、政治、社會排斥台灣的不滿，而本土化的意識就是在這樣的形式下，從1971年退出聯合國後逐漸成長。經歷過鄉土文學的論戰、反對運動、八○年代的解嚴之後，隨著本土人士的掌政，於教育體制、文化資源、生活習慣、日常語言各方面，開始走向「脫殖民」的狀況，本土化因而能較正常穩健的發展。

在此過程中，有許多學者和媒體利用國際化、外在（特別是中國）壓力，稱台灣的本土運動為孤立主義、鎖國政策，是對中國的敵意，這些論述背後都有歷史、政治的因素，我們要從這幾個因素來考量，才能真正討論台灣在本土化和全球化的挑戰中所面臨的壓力。最明顯的問題就是拼音，使用漢語拼音或通用系統的論戰中，政治往往變成一頂帽子，在語言學上較站得住腳的，能貼切描述閩南話、客家話、原住民語系表達形式的系統，反而無法被

尊重。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有許多的抉擇是地方社群接受外面其他社群的共識而逐漸形成，在Wade-Giles System羅馬拼音系統非常盛行時，許多的拼音方式還繼續使用耶魯等其他系統。我們應該讓在（再）地化接受全球化的考驗，逐漸成熟而產生共識，而非一開始就先扣帽子，在孤立主義和國際主義兩種對立的狀況下，輕易地斷送選擇機會。

這是我們需要考慮的政治因素，另外從文化因素而言，台灣的本土化其實就是全球化的過程。日本殖民時代的教育活動，以台灣大學的藏書來看，日本台北帝國大學來台學者，位階均比前往朝鮮的學者低，但因為距離及位階的關係，反而對來台學者有所補助，這些學者來台所受的優厚待遇，讓他們對台灣產生情感。台灣大學的前身，台北帝國大學，第一任圖書館館長田中長三郎就以父親遺產購買了歐洲早期重要的植物圖誌（Otto Penzig藏書，現存台大，為「田中文庫」），這是目前全世界保留最完整、最重要的早期植物科學研究，除此之外，還有許多重要文庫、與東京帝國大學一同購買的珍貴善本書，這些都是在台灣邁向科學研究、走向全球化、南進的研究裡，擁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這些學者或殖民者在台灣的在（再）地化，帶動了台灣學術的全球化，對與外面世界接軌有重要影響。這些殖民的遺產分不清是全球化還是本土化，如果特別強調漢人的本土化，把外來的日本殖民當成是帝國主義的話，未免太過忽視這些學者對台灣在（再）地化的這些貢獻。特別是許多教育工作者對台灣的熱愛，形成相當本土化的藝術表現，台灣許多重要的藝術家、學者也都是這些日本殖民者的學生。

進一步推展，許多外來的技術、財經、力量、科技、生活形式、宗教經驗等對台灣的影響，是在本土人士與之對話、挪用的互動過程中，逐漸形成吸收、再生或排斥的情況，台灣文化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因此，全球化與在（再）地化絕非互相排斥。日本的爵士音樂、阿妹原住民式的歌唱、動力火車、新加坡華人音樂、中文電腦軟體、引起西方世界注意的導演，如陳凱歌、張藝謀、台灣的李安、香港的吳宇森、成龍等，都表現出華人文化中特殊的生活型態。特別是李安的電影《臥虎藏龍》，把漢文化中俠義的武俠片和華人在美國缺乏耐性的新生代結合，而以台灣為背景的《飲食男女》、早期的《推手》、《喜宴》等作品，都表現出本土化能與全球化作某種形式的結合，這兩種面向並不一定是相互抵觸。尤其以台灣許多原住民、客家或鄉土的觀光與文化產業而言，本土化其實已在各地造成經濟與生態新生，而且也帶動「土親人親」的鄉土教育及文化認同運動，吸引觀光客及文化人士或藝術家進駐讓地方更加多元、繁榮、具有自尊，並在環球文化景觀中逐漸佔有重要地位，如蘭陽文化的競舟，台東的原住民博物館，台南的鹽水烽炮等，均使得台灣一方面立足本土，另一方面則邁向國際。

就此而言，全球化的資源對於台灣的在（再）地化，從經濟、文化生產上皆有相當大的警訊。第一個警訊來自於技術方面，我們的科技生產及產業未能與本土歷史、記憶、認同產生任何關聯，以代工方式量產的公司是靠台灣的經濟奇蹟成長，吸收許多政府補助與民間資源，特別是台灣所提供的教育與破壞環境所釋放出的商

機。然而，到大陸經商的第一代，對台灣的本土認同卻逐漸降低，最明顯的例子是王永慶、張忠謀、李遠哲等人。這些人早期都是對台灣相當熱衷的支持者，隨著他們到中國大陸訪問、投資與交流之後，就持續逼迫台灣政府加快三通，便利民間出走到對岸投資。這些人將台灣的文化認同及本土所發展出的生活方式，逐漸地視為包袱，不願加以肯定。這是在技術、財經層面上，台灣本土化必須馬上面對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能否在文化、產業這兩種活動之間，找到平衡點，讓我們的科技產品能夠與地方記憶產生關聯，如Sony強調精細、Motorola強調造型、Nokia強調創意，這些與在地民族性格產生關聯的技術產品。這種關聯能讓台灣的文化品牌、產業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如同電影和音樂在華人圈中得到品牌，且能維持繼續發展的生機。

這是在接受全球化的過程中，本土的地方記憶、文化產品能否與科技、財經發展相接軌，我們所要面臨的第一個挑戰，但扁政府在時間和策略上都犯了大錯。時間方面，加快三通讓在（再）地化的過程接受孤立和國際主義等口號的恫嚇，而形成文化、經濟和科技發展的疏空與失根，對國內各階層造成重大打擊及影響。從無業遊民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憂鬱症，接連不斷的社會暴力、家庭衝突及自殺事件，我們皆可感到文化在此無法與經濟、科技發展產生任何關聯。

第二個警訊來自資訊與教育。在資訊方面，台灣的電腦生產、中文平台在世界上占有前五年的優勢，但是政府和教育界目前並沒有對這個契機有任何動作，若無法掌握這五年的契機，台灣在華人知識、經濟的地位也相當堪憂。從早期台灣對華僑的號召能力，後來的世界日報，到現在節節敗退，連週刊與媒體也逐漸由香港（如李嘉誠）、中國大陸所掌握。中國大陸的中央電視台在最近更加強了閩南語的播放節目，利用這個方式來收編台灣的觀眾，讓大家漸漸被洗腦、中國化。這些資訊的警訊顯示，台灣早期能在海外華人世界裡取得傳播資訊的領導位置，這項契機已經逐漸喪失。台灣的民視、華視，在香港和華南地區受到相當大的歡迎，因為比起當地的中國新聞更加顯得自由、容忍、開放，但是在深圳和上海的媒體崛起後，就逐漸喪失優越性。而在電腦科技的生產上，並不能與華人的平台作真正的整合，都是落在Microsoft之後，以壓低成本的方式作量產的動作，因而逐漸出走，無法以搶奪中文軟體設計、發展便利華人使用的電腦來發展商業契機。

教育上最近的發展更是令人無法接受，主張教改的大多是長期居住國外的人士，以全球化的方式走美國路線，廢除聯考，雖立意甚美，但這些人皆無在地經驗，自己的小孩都在國外。台灣教材的轉變讓國中、高中的老師無法使用，國小課程裡一味著重語法背誦，無法培養文學賞析及想像創造能力，缺乏原住民等各族群母語課程，建構式數學更是飽受批判，這些改革不只無法提升教育水平，還造成相當大的混淆，讓下一代無法有一貫性的發展，不能與其他華人競爭。任何人看到中國大陸、馬來西亞認真地學習英文，看到馬來西亞學校強調馬來文、中文、英文、多元容忍的世界觀與資訊的開放，看到新加坡著重年輕人的創意，都會感到台灣的教育前景相當黯淡。

第三個是全球化裡有關服務業方面的警訊，台灣在地文化的服務訓練不足。百貨公司雖將服務人員送往日本受訓，政治家雖以商業、政治考察的方式引進國外的服務業，但是許多的服務，如大學內沒有美術館、博物館的設置，沒有對外開放民間教育的安排，學者紛紛以「社區大學」的不正規方式，去從事社會服務，而這些「研究」、「重點」大學也沒有與當地社區產生任何的互動，就以清、交大來說，完全是服務科學園區，而對新竹採取冷淡的態度。更重要的是，隨著人口老化，醫療網際網路的發展相當貧乏，無法將教育體制所能提供的資訊和醫療、服務、保險、傳播聯結在一起。在許多方面，各種問題仍得以個人脈胳的方式去了解，沒有整個搭建起來，譬如我們大多以打聽的方式尋找醫生（希望別再蹈張昭鼎教授的悲劇），而沒有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將這些資訊透過網際網路加以比較、整合。有關住家安全、身體教育、性別考量、心理精神疾病的復健方式等，這些都應在全球化的考量下，加強在（再）地化與本地社群的聯絡。尤其隨著人口的老化，六十五歲退休年齡之後，人還有將近三、四十年的光陰，仍需要進一步教育和服務的提供，然而台灣在這一方面相當匱缺。

另外就是市場，我們的市場只有追隨美國和日本的流行，沒有產生本身品牌規劃的主動方式，報紙裡報導的都是其他世界流行的東西，將國外流行的音樂、電影、書當作參考，我們的市場沒有自主性，沒有本土文化的特色。目前政府一味強調高科技與矽島化的政策，反而忽略了文化生態維護及文化觀光在全球市場的重要性，若以京都、巴黎、紐約、羅馬等地來看，其實地方的文化特色從寺廟、藝術、設計、建築或宗教的面向去拓展其資源，均帶動消費及其投資市場，因而不必以高科技產業或高污染的加工業為主，導致一面倒向大財團、大企業的科技掛帥作風，這些多元文化市場及其文化自尊應值得我們借鏡。因此，扁政府應該要面對資訊、技術、服務、教育和市場上的挑戰，作出更有全球化眼光及與在地資源重新整合的決策。從許多諾貝爾獎得主在全球化的文學裡，以本地的殖民史和題材在世界文壇上占一席之地，可當我們的借鏡，台灣在本土化的過程中，已吸收了很多全球化的資源，而且很少有一個小國家像我們這樣經歷過如此多的變化，語言如此豐富，歷史的經驗比起千里達、加勒比海地區都更加多元流動。如何面對未來這些新的挑戰，重新整合本土的文化資源來面對全球化，發展出台灣自己的文化品牌，則是我們應該要共同努力的目標。在這樣的認識下，全球化應該背後的動力，而本土化應該是我們的目標與對策。

【參考書目】

Appadurai, Arjun, ed. *Globalization*. Durham: Duke UP, 2001.

---.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Bhabha, Homi. *The Global Measure*. New York: Columbia UP, 2003 即將出版.

Clifford, James.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97.

Friedman, Jonathan. *Cultural Identity and Global Proces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

Canclini, Nestor Garcia. *Hybrid Cultures: Strategies for Entering and Leaving Modernity*. Minneapolis: Univ. of Minneapolis P, 1995.

Hannerz, Ulf. *Cultural Complexity: Studies i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Meaning*.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2.

---.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Culture, People, Plac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Jameson, Fredric, and Masao Miyoshi, (eds.) *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 Durham, NC: Duke UP, 1998.

Meyer, Birgit, and Peter Geschiere, (eds.) *Globalization and Identity: Dialectics of Flow and Closur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Robertson, Roland.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Rouse, Roger. "Thinking through Transnationalism: Notes o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Class Relations in the Contemporary United States," *Public Culture* 7(2): 353-402.

Shih, Cheng-feng. "Language and Ethnic Politics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lobalization, Education and Language, Tamkang University, Taipei, Nov. 15-16, 2002.

Tomlinson, John.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 1999.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Vol. 1,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Wilson, Rob, and Wimal Dissanayake, (eds.) *Global/Local: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Durham, NC: Duke UP, 1996.

Xavier Inda, Jonathan, and Renato Rosaldo,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Globaliza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朱敬一，<台灣知識份子與人文社會學門的「本土化」與「國際化」>，《知識份子與二十一世紀》，（台北：台大出版中心，1997），頁125-143。

◎